
日本太空战略军事化背景下的对美合作^{*}

卢 昊

内容提要：近年来，在战略自主意识与国家战略安全化驱动下，日本更为积极地抢占太空战略制高点，在多条战线布局推进太空战略军事化，并将对美太空合作作为实现该战略目标的核心手段。日美太空合作具有鲜明的战略指向与军事属性，基于所谓共同“威胁认知”与相互战略需求，且日益成为日美同盟关系转型的新兴驱动力，其合作机制正趋向加强，并呈现多边化、网络化趋势。当前，日美太空军事合作在设施共享、力量建设、科技研发、规则建构等多个领域均有加速发展趋势。在军事利用太空及对美太空合作方面，日本的战略主动性与目标指向性正显著加强。日美强化太空军事合作对太空安全治理造成负面冲击，也加剧了对华战略矛盾困境。

关键词：日本太空战略 军事化 日美同盟 太空安全治理

作者简介：卢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E313；E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7874 (2025) 05 - 0026 - 20

太空是继陆地、海洋、大气层之后人类生存发展的“第四环境”，并日益成为国家战略行为的“新边疆”。随着科学技术显著进步，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不断深入，太空日益成为国家间新的战略竞争热点区域。开发和利用太空的能力成为影响国际竞争格局的重要变量，也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判断其是否具备“大国资质”的关键指标。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太空战略规划，将其列为优先战略目标。对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且在后冷战时期日趋公开追求政治大国化战略目标的日本而言，太空领域亦是其战略关注重点。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太空战略是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其演变能够反映日本总体战略安全态势的变化及特征。在国家发展战略积极转型尤其是安全领域不断“突破禁区”的背景下，日本积极聚焦太空这一“新战略边疆”，不仅加速推动太空开发、制定国家级别太空战略文件，而且明确将太空应用从非军事领域拓展到军事领域，不断增强太空军事应用的比重，还积极为其构建所谓合法依据。2022 年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基于构建“跨域作战能力”理念，将太空、网络、电磁领域与海陆空领域进行有机融合，通过协同效应增强总体军事能力，强调“在安全领域发挥日本的太空能力”。^① 2023 年 6 月，日本政府出台首部《宇宙安全保障构想》以及第五版《宇宙基本计划》，强调在未来 10—20 年“战略性加强太空政策”，“以防卫为目的积极利用太空”。^② 在国际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尖端科技革新显著推进的背景下，日本太空战略的军事化正不断得到加强。

日本构建太空战略体制及军事能力，是与其推动日美同盟转型、强化同盟战略纽带的行动同步展开且日益融合的。为应对权力转移、科技进步与军事战术革新等趋势和挑战，日美以“同盟现代化”为核心概念的战略及防务合作日趋紧密。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在同盟体系中的角色与权责逐步增强，谋求“战略自主”的意识与行动也更为凸显。在服从美国战略指挥、坚持同盟“体制内发展”的前提下，日本有针对性地“战略性利用”同盟资产，使其尽可能服务于日本自身的战略需求，特别是积极推动自主战略及防卫能力的建设。如此，与美国的太空合作，也被日本当作增强本国军事能力乃至总体战略能力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日本太空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与美国进行更深度的战略捆绑，并借助美国战略支持及同盟体系下所谓“维护国际及地区安全”的名义，持续推进其太空战略的军事化，谋求在该领域的现实性权力及制度性权力。日本对美太空合作具有鲜明的战略指向及军事特性，目前正在多个具体领域快速展开，并对日美同盟转型及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① 首相官邸『国家安全保障戦略』、2022 年 12 月 16 日、https://www.cas.go.jp/jp/siryou/221216anzenhoshou/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022_pamphlet-ja.pdf [2025-05-05]。

② 参见：外務省『宇宙安全保障構想』、2023 年 6 月 1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18614.pdf> [2025-05-05]；「政府、初の宇宙安保構想決定 ミサイル防衛など利用拡大」、『日本経済新聞』2023 年 6 月 13 日。

一、日本太空战略的军事化演进

日本将太空政策上升为密切关系国家利益的顶层战略的同时，对太空的开发利用也在逐步突破非军事限制，并聚焦于军事目标与防务领域，导致其太空战略的安全导向性与军事功能性日益凸显。

二战后，日本在国家重建的过程中，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太空事业，并参与国际太空探索与开发。1955 年，东京大学丝川英夫团队首次成功发射小型固体燃料火箭；1970 年，日本利用 L-4S（Lambda 4S）火箭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卫星“大隅号”，成为全球第四个自主发射卫星的国家；此后，日本又陆续开发了 N 系列火箭（1975 年首飞）与 H 系列火箭（1986 年首飞），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实现火箭技术全面国产化。同时，日本在气象卫星、通信卫星及科学探测卫星开发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1985 年，日本发射哈雷彗星探测器“先驱号”；2003 年与 2014 年，日本先后发射“隼鸟 1 号”“隼鸟 2 号”探测器，并成功带回小行星样本；2023 年底，日本小型月球探测着陆器（SLIM）成功进入环月球运行轨道，并于 2024 年 1 月着陆月面。对此，有日本学者指出，在经济复苏推动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支持下，日本的太空事业经历了从依赖国外资源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日本逐步成为全球航天领域的重要参与者。^①

目前，在太空预算投入、综合技术实力及商业化水平等方面，日本与美国、中国、俄罗斯及欧盟相比仍存在差距，但在固体燃料运载火箭、深空探测、卫星精密制造等特定领域拥有较为突出乃至难以替代的先进性。^② 而且，围绕太空事业的发展，日本已建立起较为成熟的产学研联动体制，确保了太空探索与开发行动的战略可持续性。^③ 同时，日本持续深度参与国际航天科研合作，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参与国际空间站（ISS）合作，并成为其核心成

① 鈴木一人『宇宙開発と国際政治』、岩波書店、2016 年、5—7 頁。

② 福島康仁『宇宙と安全保障—軍事利用の潮流とガバナンスの模索—』、千倉書房、2020 年、132 頁。

③ 1955 年东京大学以丝川英夫团队为基础成立“航空研究所”，1981 年又将其重组为“宇宙科学研究所”（ISAS）。同时，日本科学技术厅于 1964 年成立“宇宙开发推进总部”，1969 年改称“宇宙开发事业集团”（NASDA），负责应用卫星与运载火箭的研发，与主导科学探测的 ISAS 形成“双轨体制”。2003 年，日本政府合并 NASDA、ISAS 等机构，建立“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

员,^① 与美国国家航天局、欧洲航天局等也结成了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不仅可以紧跟乃至引领太空科技发展趋势,也进一步获得了在太空领域开展国际博弈的资源与条件。

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禁止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在宪法规定、和平主义理念及“经济中心”导向型国家战略方针即“吉田路线”的影响下,冷战时期日本的太空开发活动基本遵循和平主义、非军事化原则,聚焦于开发太空的科学与经济价值。1969年日本国会通过《关于我国开发和利用宇宙的基本原则决议》(简称“1969年决议”),确立了“太空开发仅限于和平利用”原则。^② 但在冷战中后期,这一约束逐渐松动。比如,1985年,虽然日本依然限制自卫队研发卫星技术,但日本国会同意拨款给自卫队购买终端设备,接受美国商业、民事卫星服务。这是日本首次违背“1969年决议”而参与太空军事化利用活动。之后,随着日本力争摆脱“战后体制”、追求政治大国化目标、积极增强“安全自主”与战略能动,日本的太空开发亦逐步突破“和平利用”限制而深入军事领域。

(一) 日本太空战略军事化受国家战略安全化的深层次驱动

进入21世纪,日本国家战略发展的一大趋势是以安全战略为突破口、驱动总体国家战略转型,国家战略中的安全要素占比显著上升,主导战后日本国家发展的经济逻辑让位于政治逻辑与安全逻辑。这一趋势集中体现在2013年和2022年日本出台的两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配套的防卫政策文件,重点表现为2012—2020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的“强军战略”,并被此后历届政府继承和发展。具体就太空领域而言,2008年日本出台《宇宙基本法》,2009年据此首次制定《宇宙基本计划》并多次进行修订。这标志着太空开发活动上升为日本的国家顶层战略,并趋向于同国家安全和军事问题挂钩。2023年6月,日本首相官邸召开宇宙开发战略本部会议,并发布首部《宇宙安全保障构想》。2025年8月,日本防卫省又发布首份太空军事能力建设指导性文件《宇宙领域防卫指针》,系统规划了中远期太空军事能力发展路径,标志着日本的太空活动进一步与其国家安全战略“锁定”,太空战略军事化方针由此定型并开始实质性推进。

^① 1998年,日本签署《国际空间站政府间协议》(IGA),成为其核心伙伴。2003年,日本完成核心实验舱“希望号”的建造,并于2008年通过美国的航天飞机分三次运往国际空间站进行组装。

^② 渡邉浩崇「日本の宇宙政策の歴史と現状—自主路線と国際協力—」、『国際問題』2019年9月号、34—43頁。

一方面,日本的太空战略服从于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方针及要求。截至目前日本政府出台了两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均强调太空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将加强太空安全保障能力纳入重点战略领域,尤其后者更明确提出以“举国之力”整合国家资源来发展太空战略体系及能力。同时,2013 年、2018 年、2020 年与 2022 年版《防卫计划大纲》对“联合机动防卫力量”“跨域综合防卫力量”等理念逐步进行拓展和更新,将日本军力建设与军事部署从传统的海、陆、空扩大到新兴的天、网、电领域。2022 年“新安保三文件”(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日本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備计划》)也主张构建以导弹能力为核心、具有先发制人色彩的“反击能力”,并将其与军事利用太空、发展天基信息网络能力结合起来。由此,太空被定位为统合多军种力量、提升体系作战能力和构建进攻性军事威慑的关键前沿。上述国家安全及防务文件明确引导并推动着日本太空战略的军事化发展。

另一方面,日本围绕太空活动制定的基本法律、战略规划及政策方案,如《宇宙基本法》《宇宙基本计划》《宇宙安全保障构想》等,鲜明体现并直接推动了其太空战略的军事化进程。《宇宙基本法》强调日本的太空活动“继承宪法的和平理念”,但不再提“仅限于和平利用”,实质上已承认了将太空事业用于国家防卫的合法性。^①同时,2009 年、2013 年、2015 年、2020 年及 2023 年制定的五版《宇宙基本计划》对太空开发的战略定位、基本方针和配套机制等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中,2009 年首部《宇宙基本计划》明确将研发军用侦察卫星纳入太空开发议程;2013 年版《宇宙基本计划》强调在情报收集、警戒监视、信息通信领域加强太空开发,并使其服务于国家安全;2015 年版《宇宙基本计划》首次将安全保障作为太空开发的首要目标,并提出集中发展预警卫星系统以构建太空安全体系;2020 年版《宇宙基本计划》强调建设太空作战力量的重要性,提出以军民融合方式推进太空技术,降低国防科研风险。2023 年日本政府发布的《宇宙安全保障构想》中强调建立“自立的太空利用大国”,“根本上强化太空安全保障能力”,提出“来自太空的安

① 与此相应,2012 年日本出台《宇宙航空开发研究机构(JAXA)法》,并废除 1969 年的《太空开发委员会令》。前者不再包含后者关于太空开发“仅限于和平目的”的表述,从而为 JAXA 从事太空军事研究创造前提。

全保障”与“基于太空的安全保障”两项理念。^① 同年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五部《宇宙基本计划》中进一步规定了对太空进行军事利用的目标方针、具体手段及成果指标。^② 2025 年发布的《宇宙领域防卫指针》进一步聚焦军事领域，对构建太空军事能力的路径手段进行规定，明确把太空列为独立作战域，在表面维持“专守防卫”的同时，实质推进“防区外防卫”等进攻性军事能力建设，建立更加紧密的军民协同机制，并同时配合出台《下一代情报通信战略》，进一步要求整合民间信息通信技术，加紧规划具有实战意义的“太空防御体系”等。^③ 综上可以看到，在日本太空发展计划中，军事利用太空的内容日趋明确且逐步加码。相关法律、制度、政策的着眼点正从宏观战略规划和技术研发逐步向具体防务工作及实战能力构建转移。

（二）日本太空战略军事化布局正在多条战线全面展开

安倍第二次执政时期，日本在“强军战略”总体布局下大力推动太空战略机制与能力建设并取得进展。此后菅义伟、岸田文雄继承安倍政策方针，声称“为保护国家安全而‘彻底地强化防卫能力’，将太空视为‘全天候、无缝隙安全保障’的关键一环，‘从根本上扩大太空系统的防卫利用，确保太空安全且稳定’”。^④ 岸田政府甚至将太空定位为“围绕外交、防卫、经济、信息等国力的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舞台”，力图利用太空能力，增强以军事为首且涵盖外交、经济、技术等领域的综合国力。^⑤ 2024 年 10 月石破茂上台后，也强调要建立并强化包括太空领域在内的全方位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并继续加大对该领域投入的力度。在 2025 年度日本防卫预算中，太空军事领域的预算同比增长 115%。^⑥ 具体

① 两项理念中，前者指利用太空系统保障日本的安全，后者意在确保太空系统“免受他国威胁与安全风险”。参见：外務省『宇宙安全保障構想』、2023 年 6 月 1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18614.pdf> [2025-05-05]。

② 内閣府『宇宙基本計画』、2023 年 6 月 13 日、https://www8.cao.go.jp/space/plan/plan2/kaitei_fy05/honbun_fy05.pdf [2025-05-05]。

③ 王晓艳、丰松江：《以“防御”为名进一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加速推进太空军事化步伐》，《解放军报》2025 年 8 月 14 日。

④ 「首相『投資の好循環生み出す』、新基金で宇宙開発を支援」、『日本経済新聞』2023 年 12 月 22 日。

⑤ 「宇宙活用で日本の守り固めよ」、『日本経済新聞』2023 年 9 月 5 日。

⑥ 2025 年度日本防卫预算中涉及太空军事的项目，包括拨款 2833 亿日元构筑“（低轨）卫星星座”，即自卫队版“星链”，该项目约占本年度防卫预算总金额的 3.25%。其他重要项目包括：拨款 52 亿日元开发“战术 AI 卫星验证星”、拨款 97 亿日元开发“新一代防卫技术验证卫星”以及拨款 30 亿日元用于“应对高超声速滑翔武器”（HGV）相关技术的研究。参见：防衛省『令和 7 年度歳出概算要求』、<https://www.mod.go.jp/j/budget/gaisan/r7/gaisanyoukyu.pdf> [2025-05-05]；《日本加快太空军事化布局》，《中国国防报》2025 年 5 月 22 日。

而言，日本太空战略的军事化进程正在以下战线重点布局和推进。

第一，加强对太空的军事利用，推动太空利用能力在军事领域的转化。日本意图建立“广域、高频及高精度的信息情报系统”，在现有情报采集卫星（IGS）、军用通信卫星基础上，通过大量发射多频段小型卫星，在 2028 年左右初步构建起“卫星星座”即分布式卫星系统，并利用数据中继卫星、量子通信及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加强该系统的信息传输分析能力，以提升战区外（stand-off）导弹防御能力及海洋态势感知（MDA）能力，特别是针对高超声速滑翔武器（HGV）的预警拦截能力。日本还力争强化地球静止轨道、低轨道卫星功能并建设高速大容量通信线路，以建立多层次、抗拦截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系统，增强军事情报通信能力，通过提升准天顶卫星系统（QZSS）的功能和稳定性，逐步构建独立自主的军民两用卫星导航系统。此外，日本提出构建“大规模且灵活”的太空运输系统，强化太空运输载具特别是升级火箭能力，增加火箭发射频率并完善发射装置及设施。

第二，争取对太空的军事控制，强调从平时到战时的太空主导权。日本积极加强对地月间太空环境及各层级地球轨道的监控，在 2023 年启用太空态势感知（SSA）系统基础上，进一步建设太空领域感知（SDA）系统，^① 提升对太空碎片、在轨反卫星攻击、电磁干扰的应急响应和处理能力，为平时状态下的太空监视以及战时状态下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② 为此，日本积极建设太空（含空间感知）领域专业部队，并将其与网络战部队结合，全面升级卫星、雷达等观测设备，并计划在 2026 年左右发射首颗搭载光学望远镜的 SDA 卫星，发展太空燃料补给技术等在轨服务技术，以维持卫星的长周期及经济化运行。日本也高度重视月球的战略价值，积极推进月面探测乃至登月计划。2023 年 9 月，日本发射月球探测器（SLIM），并于 2024 年 1 月登陆月球表面。日本还与美、欧共同推动“阿尔忒弥斯”计划，期望尽早实现载人登月目标。此外，日本力图与盟友加强协调，在共享太空信息及监控资源的同时，联合主导制定太空活动规则，在国际规则层面进一步加强对太空的主导权。

① SSA 可探测、识别、跟踪和编目地球轨道上的物体，SDA 则力图在 SSA 的观测数据情报基础上，更快速地反映太空物体动态，并对其行动加以预测，具有更强军事功能。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从 2019 年起在条令中以 SDA 全面取代 SSA，日本亦在 2022 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此后战略文件中参考美方用法引入 SDA。参见：「宇宙の未来、持続可能な宇宙利用へ 展望議論」、『日本経済新聞』2023 年 10 月 25 日。

② 外務省『宇宙安全保障構想』、2023 年 6 月 1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18614.pdf> [2025-05-05]。

第三，强化太空军事能力基础，实现太空科技与产业的良性循环。日本强调以“寓军于民”“以民掩军”的方式，构建太空相关军工产业与科技能力，发挥私营部门活力、汇聚战略投资，同时淡化行动的军事目的性。根据规划，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将在太空技术开发中强化牵头作用，并与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新能源与工业技术综合开发部门（NEDO）等合作，综合调动大学、科研机构及企业力量，将国防计划、军事需求与科技研发、商业应用紧密结合，强化内部信息共享、技术合作与资本流动，建立更高效的产学研联动机制，力争在2030年使太空设备市场规模较2020年翻一番，达到8万亿日元。^①2023年6月日本政府发布《宇宙安全保障构想》后又着手制定《太空技术战略》，并于2024年3月发布该战略，2025年3月再度修订。《太空技术战略》以维持尖端技术优势与供应链自主为目标，将卫星、太空科学探测、太空运输、跨领域通用技术定为重点攻关领域，设定了具体技术发展路线。^②2023年11月，日本政府出台《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法（修订版）》，宣布设立“太空战略基金”，首期注资3000亿日元，未来十年内提供1万亿日元，支持民间企业在太空高科技领域加大投资，提高设备国产化率，引导科研机构“根据战略与作战需求”开展研究，并应用于太空军事项目。^③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制定“国家防卫产业战略”，力图进一步强化防卫力量建设的产业与技术保障，而太空相关产业的培养发展与技术创新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二、日本太空战略军事化进程中的日美合作

日本太空战略军事化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利用太空资源支持和增强军事能力及作战效能，并实现对太空空间的军事主导。^④作为超级军事大国及日本军

① 「安全保障の新領域『宇宙』で官民連携 民間の技術を防衛に活用『今後5年が正念場』」、『読売新聞』2023年10月14日。

② 参见：内閣府『宇宙技術戦略（案）の概要詳細版』、2024年2月26日、https://www8.cao.go.jp/space/public_comment/r6_gijutu_senryaku/syousai0301.pdf [2025-05-05]；「宇宙産業の設計図を描く 日本の成長の糧に」、『日本経済新聞』2024年1月5日。

③ 参见：内閣府『宇宙戦略基金今後の検討の方向性について』、2024年2月、https://www8.cao.go.jp/space/committee/dai109/siryou3_2.pdf [2025-05-05]；「首相『投資の好循環生み出す』、新基金で宇宙開発を支援」、『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12月22日。

④ Matthew Mowthorpe, *The Militarization and Weaponization of Space*,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4, p. 1.

事盟友，美国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冷战时期日美太空合作局限于科学及民用领域，而且美国基于战略控制日本和防止导弹能力扩散等考量，有意限制日本的太空开发活动。^① 但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强化对美军事合作为契机，日本开始在太空问题上局部性地“突破禁区”。比如，1985 年日本政府以与美军演习中情报通信不便为由，运用“一般化原则”（generalization theory）作为解释，允许自卫队使用人造通信卫星等设备。^② 2003 年起，日本又与美国开始共同研发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事实上已违反了对太空“非军事利用”的原则。^③ 21 世纪初特别是 2008 年日本出台《宇宙基本法》后，日美开始切实推动太空军事合作。一方面，日本日益坚定地以“战略自主”为终极目标，谋求依托同盟体制实现自身综合军事能力的“战略性跃进”，包括推进太空军事战略化；另一方面，美国亦意图调动日本在同盟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因而纵容日本谋求“安全自主”，实施“强军工程”，包括对日本的太空军事利用活动“松绑”，乃至扶持其发展太空军事能力。日美开始构建政府间太空战略对话机制，将太空军事合作明确纳入同盟合作议程，并在诸多战略问题上形成相互呼应。^④

近年来，日美通过高层战略沟通，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太空军事合作的方针。2023 年 1 月，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美国会见拜登时，日美首脑重点商讨了太空合作，强调双方签署的太空合作协议是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重要补充”，日美将在太空领域构建“共同防御体系”。2024 年 4 月岸田再次访美，与拜登发表题为“面向未来的全球合作伙伴”的联合声明，确认两国将在太空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加强合作，美国承诺将为日本的太空项目提供更大支持，并将其全面纳入同盟合作议程。2025 年 2 月，石破茂首相访

① 比如，1969 年 7 月美日签订太空合作备忘录（1976 年及 1980 年又加以续签），美国向日本提供液体燃料火箭及民用卫星技术和设备，但不提供固体燃料火箭技术以及火箭再入大气层技术。同时，根据日美协议，日本利用美国技术制造的火箭、卫星及其组件，未经美国许可禁止向第三国转移，使用日本火箭发射外国卫星也需征得美国同意。参见：渡边浩崇「日本の宇宙政策の歴史と現状—自主路線と国際協力—」、『国際問題』2019 年 9 月号、34—43 頁。

② 所谓“一般化原则”，指自卫队使用不具备杀伤力和破坏性且已批量标准化生产应用的“一般性”卫星设备，不违反“和平利用”原则。参见：青木節子『日本の宇宙政策』、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 年、125 頁。

③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 Ballistic Missile Defence and Remilitarization”, *Space Policy*, Vol. 29, Iss. 2, 2013, pp. 128 – 134.

④ 福島康仁「宇宙利用をめぐる安全保障—脅威の顕在化と日米の対応—」、『グローバル・コモンズにおける日米同盟の新しい課題』、国際問題研究所、2014 年 3 月、24 頁。

美，与特朗普会见并磋商下一阶段强化同盟举措，日美两国首脑再次就太空、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的战略合作进行了深入讨论。目前，日美同盟体系下的太空军事合作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日美太空军事合作基于共同“威胁认知”与相互战略需求

日美两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及太空战略相关文件均大力渲染太空领域国际竞争以及所谓“太空安全威胁”，为本国军事利用太空寻求“合法化依据”。美国从维护全球太空霸权的目标出发，强调战略竞争对手的太空军事能力及“进攻性姿态”对其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与秩序主导构成威胁。^①日本则侧重从警惕周边安全威胁的逻辑出发，积极渲染所谓周边国家“核与导弹威胁”，以及增射军事卫星、加强太空利用等行动。^②在日美当前的“威慑认知”中，首先，太空已成为重要军事领域，俄乌冲突等“新型战争”中对卫星通信、遥感技术的应用印证了“太空利用直接关系军事优势”；其次，未来太空可能直接成为战场，太空空间日益拥挤和反卫星武器的开发已构成对太空安全的重大威胁，且目前尚无有效规则及手段加以制约；再次，数字化、人工智能所引导的新科技革命及私营部门的航天技术革新正驱动新的战略模式，各方围绕太空资产的争夺与利用趋向高潮；最后，在太空竞争参与者中，中国因其快速进步能力及所谓“改变现状”意图而成为日本高度警惕对象，并被其设定为“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一道维护太空稳定利用与自由进入，确保领先地位以应对（来自中国的）迄今未有的长期战略挑战”。^③

在上述“威胁认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日美的太空合作需求日益增强。在日本看来，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日本当前太空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依据，也是未来发展自身太空能力的重要战略资产。日本战略决策层认为，美国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及全球军事盟友网络，在卫星技术、空天监视、太空武器系

① 参见：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11-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2025-02-07];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pace Policy Review and Strategy on Protection of Satellites”, September 2023, <https://media.defense.gov/2023/Sep/14/2003301146/-1/-1/0/COMPREHENSIVE-REPORT-FOR-RELEASE.PDF> [2025-02-07]。

② 外務省『宇宙安全保障構想』、2023年6月1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18614.pdf> [2025-02-07]。

③ U. S. Department of Air Force,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the Space Force”, August 23, 2023, <https://www.spaceforce.mil/Portals/2/Documents/Space%20Policy/CRR-FY23-Comprehensive-Strategy-Space%20Force-15-Aug-23.pdf> [2025-02-07]。

统、太空作战部队等领域，即使面临中、俄等挑战，仍可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亚太的和平稳定需要美国发挥威慑力，而美国所主导的太空系统对其发挥威慑力极为重要。”日本的军事情报系统、导弹防御系统乃至自卫队行动也仍依赖于美国的 GPS 等天基信息系统支持。^①同时，日本可利用与美国的太空技术合作，在发展太空军事能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还可依托美国发达的科研部门及商业航天产业，刺激拉动本国军工产业及研究活动。而在美国看来，日本相比自身虽然在太空能力上有所差距，但仍可为其构建全球太空战略体系提供重要支持。比如，美国扶持日本构建太空监视网络，并与美方网络互联，可弥补其在亚太监测站点的欠缺，扩大监控与情报网络。而且，日本在卫星制造及发射、全球定位导航系统、芯片技术、太空垃圾处理等方面拥有较强的技术基础，可为美国的太空攻防能力建设提供助力。^②

（二）日美太空军事合作日益成为同盟关系转型的新兴驱动力

21 世纪以来，日美为应对国际权力转移、共同护持霸权，不断推动同盟关系向“全球型”“综合型”方向发展。相比已然成熟的传统防务合作，立足“新战略边疆”的太空军事合作成为日美战略合作的新兴增长点，并为同盟转型提供新的驱动力。2011 年，日美外长与防长“2+2”会议提出，在同盟体系内开展太空态势感知及海洋态势感知合作。2015 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首次以独立章节阐述日美太空军事合作，授权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导弹预警、作战指挥、太空监视、卫星通信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共同确保太空系统的机动性与抗毁性。^③同年，日本第三版《宇宙基本计划》首次提出日美太空合作“进入新时代”，将通过太空合作强化日美同盟确定为日本太空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④此后，太空军事合作被纳入日美高层磋商的“常规议程”，合作内容则从情报等具体业务及战术协助逐步上升至力量建设、关键技术共享乃至战略对接层级。

① 内閣府『宇宙基本計画』、2023 年 6 月 13 日、https://www8.cao.go.jp/space/plan/plan2/kaitei_fy05/honbun_fy05.pdf [2025-02-07]。

② Bruce McClintock, “Charting a Path to Thoughtful Allied Apace Power”, RAND Cooperation, January 2024,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briefs/RBA1739-1.html [2025-02-07]。

③ 防衛省「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2015 年 4 月 27 日、<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book/pamphlet/pdf/guideline.pdf> [2025-02-07]。

④ 外務省「平和目的のための月その他天体を含む宇宙空間の探査及び利用における協力のための日本国政府とアメリカ合衆国政府との間の枠組協定」、2023 年 1 月 1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ila/st/page24_002128.html [2025-02-07]。

岸田政府上台后积极强化日美同盟，推动“同盟现代化”，并将太空军事合作作为应对新型高科技战争、提升同盟威慑力及应对力的重要抓手。2022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宣称将在跨域作战和行使“反击能力”方面加强日美军事一体化，为此将大幅加强太空及网络领域的日美合作，并与尖端技术装备合作、高级别实战训演、情报共享、警戒监视和侦察（ISR）活动及设施设备共享等相结合。^①此外，2023年1月，日美外长与防长“2+2”会议提出，太空合作已成为日美同盟“优先议程”，日美调整军力态势行动“包括且特别考虑到太空及网络领域”；《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适用范围亦扩大到太空，即日美一方受到“针对太空的、来自太空的或在太空内部实施的攻击”时，将在逐案研究基础上进行“共同防御”。^②同期，日美还签署了太空合作框架协议，表明双方将在太空相关科学技术及其“安全化应用”方面广泛开展合作。^③此外，2023年1月及8月的日美首脑会谈、2023年10月的日美防长会谈以及2024年4月的日美首脑会谈均强调深化太空合作，使其符合加强同盟功能保证、互操作性和运营合作的合作总方针，并助力提升同盟联合遏制力和应对力。^④

（三）日美太空军事合作机制趋向加强，并呈现多边化、网络化趋势

日美力图在太空军事领域构建多层次合作机制。目前，日美首脑会谈及“2+2”会议负责引领两国太空军事合作的基本方针及重点领域，具体业务协调则由以下三项机制承担，即“日美太空全面对话”、“日美太空安保高级别协商”与“日美太空重点事项协商”。其中，“日美太空全面对话”于2013年启动，目前已举行八轮对话，参与方为两国涉及太空事务的政府部门及科研机构负责人，定期进行太空政策磋商，商讨落实情报共享、专家合作培养及桌上演习等事项。“日美太空安保高级别协商”是负责落实日美外长防长“2+2”磋商决议的专门协商机制，于2012年启动，目前已举行六轮，参与

① 首相官邸『国家安全保障戦略』、2022年12月17日、https://www.cas.go.jp/jp/siryoku/221216anzenhoshou/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022_pamphlet-ja.pdf [2025-02-07]。

② 防衛省「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2+2）共同発表」、2023年1月11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npo/2023/0112a_usa-j.html [2025-02-07]。

③ 内閣府『宇宙基本計画』、2015年1月9日、<https://www8.cao.go.jp/space/plan/plan2/plan2.pdf> [2025-02-07]。

④ 参见：外務省「日米首脳会談」、2023年8月1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1_001786.html [2025-02-07]；防衛省「日米防衛相会談の概要」、2023年10月5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npo/2023/1005a_usa-j.html [2025-02-07]。

方主要为两国外交、防务部门局级负责人。“日美太空重点事项协商”则聚焦两国太空合作具体事项，包括卫星定位系统协商、态势感知一体化协商以及太空反导体系建设协商等。另外，作为两国太空科研牵头机构，JAXA 与 NASA 之间亦保持定期对话与合作。上述机制使日美围绕太空军事合作的协商得以经常化和制度化进行，并能迅速转化为成果。

除双边层次外，日美的太空军事合作机制还向多边层次“外溢”。在美国主导下，日美在太空军事领域的“小多边”合作日趋增加，比如 2011 年启动的日美澳三边太空对话、2023 年日美韩戴维营会谈后启动的日美韩三边太空对话等。在日美联合推动“印太战略”背景下，日美澳印四边安全对话（QUAD）亦成为太空军事合作的多边机制平台。2021 年 9 月 QUAD 首次首脑会谈上，四方同意建立太空合作工作小组，并启动卫星数据共享；2022 年 5 月第二次首脑会谈上，四方提出构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AD）；2023 年 5 月第三次首脑会谈上，四方强调将利用共享卫星数据加强对“印太”海洋通道的监控。^① 同时，在美国支持下，日本还在与北约的“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2023 年签署）框架内，与其他北约盟国加强太空多边合作。^② 2022 年，美、英、法等七国成立“联合太空作战愿景”（CSPO），日本于 2023 年 12 月正式加入这一框架，与“五眼联盟”国家围绕太空监视、军事训演等深化合作。^③ 在日本助力下，美国得以拓展并巩固在亚太的太空军事合作网络；而日本亦利用美国的盟友体系，尽可能为自身的太空战略军事化争取外部战略支持。^④

三、当前日本对美太空军事合作的重点领域及举措

同盟体系下的日美太空军事合作为日本太空战略军事化注入了重要动力。冷战后期日本太空战略军事化的起步，与日美在同盟体制下深化防务合作特别是建立装备、演训制度化安排直接相关。进入后冷战时期，特别是 21 世

① 内閣府「日米豪印の枠組みにおける宇宙分野の協力」、<https://www8.cao.go.jp/space/committee/01-kihon/kihon-dai21/siryou6.pdf> [2025-02-07]。

② 外務省「岸田総理大臣の NATO 首脳会合出席」、2023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7_000044.html [2025-02-07]。

③ 「防衛省、宇宙安保の多国枠組み参加 情報共有で監視強化」、『日本経済新聞』2023 年 12 月 5 日。

④ 李艳：《日本太空战略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8 年，第 240—241 页。

纪以来,在日美同盟转型发展、战略协同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双方均有意构建所谓“太空安全同盟”。日本在“建设性追随”及“战略性利用”与美国同盟关系的方针下,在太空领域也明确并坚持借助外部力量强化自身实力的思路。拜登政府重视并调动盟国及“伙伴国家”作用,促其积极协助美国的全球及区域战略、实施对华战略竞争。对岸田政府而言,这是加强其与美国合作、利用同盟资产增强自主战略能力的绝佳时机。在此背景下,日本积极在太空战略理念及具体政策上与美国对接,包括参考美国《国防太空战略》《太空优先事项框架》《太空作战规划指南》等制定本国相关战略政策文件,引入并应用美国的太空战略战术理念等;^①此外,加紧推进与美国的太空军事合作,持续提升其在同盟战略协作中的优先级。日美协同增强太空军事合作的方针及步调并未因2024年两国的“政权更替”受到影响。石破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也积极磋商、推动相关议程,继续在太空军事领域开展紧密合作。当前,日本对美太空军事合作的重点领域及举措如下。

(一) 共建共享多层次太空军事设施

为强化“制天权”、有效利用太空资源增强作战能力特别是反导能力,日美加紧在日本现有太空态势感知系统的基础上,加强系统并联与设施共享,并进一步建设更具军事功能性的太空领域感知系统。^②2023年1月及5月,美太空军分批次向日本交付两个准天顶卫星(QZSS)系统托管有效载荷,双方部队还积极深化联盟、加强综合威慑态势,着手共享数据链与计算机分析系统,并支持日本与美国及其他北约盟国开展更紧密的卫星情报交换。根据日美中长期计划,双方将联合构建多层次卫星通信及监视体系。在平流层,日美将共同研发及利用准静止的高空平台基站(HAPS);在地球低轨道区域,日美将主要利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星链”;在中轨道区域,日美将共建并共享“卫星星座”;在高轨道区域,日美将进一步打通美国GPS系统与日本QZSS系统间的联系,加强信息共享。2023年3月,日本防卫省与SpaceX签署合同,由后者向自卫队提供“星链”通信设备,并计划在2024—2027年三年间为海上自卫队90%的水面舰艇配备“星链”信号接收终端。这标志着自卫队首次在地球轨道上使用国外私营卫星开展军事活动。

^① 福岛康仁「宇宙の軍事利用の傾向と日本の防衛政策への示唆」、『NIDS コメンタリー』2022年第235号、26—27頁。

^② 2023年,日本正式启用SSA系统,该系统集成了自卫队与JAXA的卫星、雷达、光学望远镜等设备,并可与美军相关系统直接交换信息数据。

2023 年 10 月，日美防长会谈确认就建设太空监视体系加强合作，美国同意支持日本从 2024 年起大规模建设“卫星星座”，并提供必要的卫星模块组件及技术支持。^① 另外，日美还在日本本土联合部署、共享使用陆基太空监视设施。2023 年，日本自卫队在山口县建立的“深空先进雷达”投入使用，并接入美太空军全球监视网络（SSN）。^② 美国还计划在日本部署新型太空监视雷达、太空望远镜，增加部署反导雷达等，并与日本全面共享数据，补强覆盖亚太地区的军事侦察及反导网络，乃至打造全球性、全天候、可应对平时及战时情况的太空军事设施体系。

（二）积极打造一体化太空作战力量

在美国推动下，日本加速其太空部队的“建军”步伐，且在人员配置、组织结构、装备系统上高度效仿美太空军。目前，日本已在航空自卫队内部组建太空作战力量，并将其与网络战及电子战部队结合，打造“太空网络防卫集团”。^③ 同时，2025 年 3 月，自卫队正式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统管海陆空各军种及新型战略部队。美军亦扩大了驻日美军司令部权限，加强与自卫队新司令部的协调和信息共享，包括在太空军事领域的战术联动。其实，早在 2023 年下半年，美国就开始推进新设驻日太空军，负责本区域卫星通信、武器系统位置信息和导弹预警等相关任务。^④ 2024 年 12 月，美国驻日本太空军成立，部署在横田基地，与日本自卫队“太空网络防卫集团”紧密协作，利用卫星及通信情报系统，支持驻日美军的行动以及美日联合军事行动。美太空军高层访日时，日美同意基于“弹性太空体系”理念，联合打造具有威慑力、灵活性及敏捷性的太空部队。日本将向美太空军及 NASA 增派自卫官及技术官员，接受美国多轮培训。自卫队 and 美军将在太空监视、导弹预警、指挥控制等方面加强情报及战术战法交流，自卫队将进一步引入美太空军的

① 防衛省「日米防衛相会談の概要」、2023 年 10 月 5 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mpo/2023/1005a_usa-j.html [2025-02-07]。

② 「米軍と連動宇宙監視システム整備 山陽小野田市にレーダー設置」、『長周新聞』2023 年 4 月 2 日。

③ 2020 年日本在航空自卫队内设“宇宙作战队”，2022 年扩编组建“宇宙作战群”，下设两个“宇宙作战中队”及一个“宇宙系统管理中队”，分别负责太空态势感知系统、电磁干扰系统以及太空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根据日方计划，航空自卫队将在集成太空、网络及电子战部队基础上，于 2027 年正式升级为“宇宙航空自卫队”。

④ 「米宇宙軍、日本に司令部の創設を検討 来日中の同軍トップが明らかにも」、『朝日新聞』2023 年 9 月 25 日。

标准化训练科目及流程，与美方共同开展实战操练。^① 日本还积极参加美国主持的“全球哨兵”“施里弗”“太空旗帜”等太空军演，并于2024年3月首次派员参加北约主导的“阿斯特里克斯”等太空军演，从2024年起参加CSPO体系下的太空军演与人员培训项目，以加速培养本国太空部队核心力量，进一步融入以美国为首西方盟友的太空作战力量体系。

（三）联合推进“战略关键性”太空科技研发

在太空军事合作中，日美强调聚焦“战略关键性问题”，共同维护在太空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② 日本力图针对自身短板，最大限度吸纳美方科技优势，并转化为自身战略资产。根据2023年签署的日美太空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强化JAXA与NASA的联合牵头作用，深化太空相关基础科学研究合作，重点推进卫星通信、空间遥感、载人航天及空间站建设、行星探测等领域的应用技术合作，支持两国企业在卫星制造、火箭发射、蓄能设备、精密元件、特殊材料等方面加强研发生产合作，同时推动两国太空装备技术在标准、制式上的一致性，为未来的部队一体化运用创造条件。^③ 日本还通过为月球轨道空间站（Gateway）提供设备及后勤支持，参与美国主导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在争取实现登陆月球乃至火星目标的同时，依托美国的支持，就地球、空间及行星科学中的重大前沿问题以及“太空航线”开拓、太空资源利用等项目深入开展验证研究，挖掘月球在未来“太空战场”中的潜在军事价值。同时，日美将发展对高超声速滑翔武器的预警拦截能力定为合作重点，共同研发搭载在卫星上的高敏度红外传感器以及新型高速拦截弹头。2023年8月日美首脑戴维营会谈上，双方就联合研发HGV拦截系统达成协议。^④ 日本将上述与美国开展的合作视为迅速增强自身“反击能力”的关键。另外，日美以落实“日美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为名，强化经济安全合作，联手构筑“小院高墙”，积极探索数字化、人工智能、量子科学、通信技术等的军事利用前景，联合推动相关民用成果应用于太空军事领域，并力争加强对相关技术及装备的垄断能力，从而在“战略关键性”太空科技研发及其军

① 「米宇宙軍作戦部長が来省 木原防衛相『宇宙領域は死活的に重要』」、「朝雲」2023年9月26日。

② 外務省「共同声明 宇宙に関する包括的日米対話第8回会合の開催」、2022年5月13日、<https://www.mod.go.jp/j/press/news/2022/05/13a.html> [2025-02-07]。

③ 「安全保障の新領域『宇宙』で官民連携 民間の技術を防衛に活用『今後5年が正念場』」、「読売新聞」2023年10月14日。

④ 「極超音速兵器迎撃ミサイルGPIの日米共同開発が正式発表」、「朝雲」2023年8月19日。

事应用中占据优势地位。^①

（四）协同主导有利于己的太空国际规则

当前，美国联合西方盟友推动所谓“太空负责任行为准则”，在 CSPO 体系下抛出所谓“太空行动的共同指导原则”，名义上是为了制订并完善太空安全治理相关规则，实质则是利用盟友支持，在控制战略成本的同时维护太空霸权，阻遏战略对手。日本积极协调美国行动，在国际场合公开倡导构建“基于价值观及法治原则的太空国际规则”，敦促各国采取“负责任的太空行动”。2022 年 9 月，日本追随美国提出“不再进行破坏性直升反卫星导弹试验”。随后，日美又在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各国“不在太空部署或发展核武器”，企图在抢占道义高点的同时干扰既定太空国际议程。日美在共同推动“阿尔忒弥斯计划”过程中，强调要制定有关月球轨道活动、表面探测、资源开发的国际规则。日本特别注重利用其拥有应对太空碎片的技术优势，与美国联手谋求构建“太空交通管制系统”，制定所谓“国际太空交通规则”，其实质是意图加强太空监视能力并制约他国太空活动。日本还与美国及欧盟深化太空相关产业技术合作，在太空技术应用出口管制、市场监管等领域提出所谓“透明化”“民主化”“非军事化”等原则及具体规则，企图与盟友共同确保相关国际秩序主导权，同时继续以军民融合方式、在“民主盟国”范围内构筑排他性太空技术及供应链联盟，以维持竞争优势。日本积极参与并推动太空透明度和信任措施（TCBM）等国际协商，与美国保持统一立场，并借机大力宣传本国“和平立场”及“宇宙安全保障构想”，宣称与“民主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紧密合作。近年来在国际舆论场合，日本日益高调地协同美国煽动阵营对立、制造安全恐慌，明指暗批中、俄“太空政策缺乏透明度”“研发进攻性太空武器”“制造太空安全威胁”，其中又更为热衷于炒作所谓“中国太空威胁论”，意图为自身的太空战略军事化提供合法依据，提升自己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

四、结 语

日本太空战略军事化是其国家战略安全化、安全战略进取化在太空领域

^① 《日美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CoRe）为当前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框架协议，于 2022 年 5 月拜登访日时签署。

的具体体现,强化对美太空合作已成为目前日本推进其太空战略军事化的核心手段。战后日本太空利用逐步突破非军事限制的进程显示,美国的默许与支持是日本在太空领域“突破禁区”、推动军事化进程的先决条件。冷战中后期,美国为应对冷战新阶段形势,开始主动推动日本加强对美防务合作,且不限于常规作战领域,而是涉及太空等“新作战领域”,包括要求日本向美国提供相关民用技术等。而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基于维持亚太地区战略主导、制衡中国崛起等目标,对日本的战略需求持续走强,更加注重发挥日本在本地区的“战略前沿”作用,放手支持日本摆脱政治约束、增强安全战略的能力。这与主导日本政坛的保守政治势力谋求“正常国家化”及政治大国化、推动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呼声形成共振。^①在日本看来,对美太空军事合作不仅对日本太空能力实现“战略性跃升”意义重大,亦显著有助于日本增强同盟体制的稳定性,体现“应对多元威胁与战略挑战的能力”,从而在更广泛领域锁定美国的战略支持,同时也将为日本追求“安全自主”、增强“自主保护国家的能力”而持续提供战略及政策上的动力。^② 尽管美国宣称在太空领域正面临来自中国的所谓“严峻挑战”,但现实是,美国在卫星技术、空天监视、太空武器系统和太空作战部队等方面仍拥有先进技术和强大实力,是全球太空军事领域的领导者。在同盟关系驱动以及美国强大实力与先进技术的引领下,日本的太空战略军事化在战略思维、战术目标、策略手段等方面日趋“美式化”,与美国的战略捆绑不断增强。

日本太空战略军事化成为当前日美同盟转型特别是所谓“同盟现代化”的“重要增长点”。尽管日美合作逐步向经济技术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但决定同盟形态的“同盟现代化”仍聚焦于传统安全领域,且日益明确地以中国为针对目标。当前,日美同盟防务合作重点包括升级联合指挥与控制系统、支持日本增强联合作战能力及先制性“反击能力”、加强军工产业合作及供应链融合、深化信息和网络安全合作等,这些举措均与太空军事利用存在广泛交集。同时,日美还积极推动与其他盟国在太空领域的合作。换言之,太空军事合作将为日美防务合作全面“赋能”,同时为日美主导的地区盟伴体系拓展提供助力。在日美太空军事合作中,美国无疑是引领者,但也需看到,日本是主动而非被动地将本国太空战略军事化与强化日美太空合作的进程相融

^① 卢昊、杨伯江:《大国博弈下的日本战略安全态势及其对华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32—47 页。

^② 青木節子『中国が宇宙を支配する日—宇宙安保の現代史—』、新潮新書、2021 年、203 頁。

合，并体现出在盟内谋求战略自主与实力增长的强烈意识。

一是军事利用太空及对美太空合作方面，日本的战略主动性与目标指向性正显著加强。与日美其他领域关系类似，基于国力相对弱势及同盟关系中的从属地位，日本在太空领域也需要服从美国的总体战略要求。但日本自身战略自主意识以及美国放任鼓励日本承担更多权责的倾向增强，对双方的合作姿态与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日美在太空合作方面的需求是双向的，但由于美国的优势地位，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更强，其战略战术受美国影响更深，这也促使日本在对美交涉中主动出击，积极拉住美国并设法争取自身利益。在对美太空合作方面，日本的战略主动性与目标指向性体现在：（1）针对自身需求特别是能力短板，有重点地推进对美合作，确保获得优质同盟资产，促成太空能力向军事能力的高效转化；（2）强调调动自身在经济技术、国际协调等方面的有利筹码，尽可能以平等姿态与美国开展合作；（3）利用美国的盟伴关系及自身多边外交优势，在美国之外拓展安全合作伙伴，将欧洲、亚太乃至“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纳入自己的多元化太空国际合作布局中。这反映出日本当前太空战略乃至国家总体安全战略的基本思路，即将在日美同盟“体制内发展”作为主要路线，并与另两条关键路线即自主力量建设以及“民主盟伴”网络构建结合起来，通过“三线联动”来更有效地实现自身战略目标。

二是日本对美太空军事合作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但也面临一定制约因素及障碍。在日美双方战略需求“高频共振”及积极战略行动下，日美太空军事合作在设施共享、力量建设、科技研发、规则建构等多个领域均有加速发展趋势，围绕太空能力建设及太空空间主导，日美的战略协调与防务合作路线图日趋清晰，举措逐步进入“深水区”。在岸田政府执政后期以及石破茂政府上台后，日美始终将发展太空军事合作置于安全政策协调的优先议程。可以预见，未来日美太空军事合作仍将保持较快发展，不仅两国政府决策层、主流战略界持有较为强烈的合作共识，两国国防相关产业及利益团体也热衷于推动两国太空军事能力建设的合作特别是产业供应链体系的融合。但亦需看到，日美在该领域的合作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日美太空合作到达一定程度时，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的保密手段乃至防范规则也将适用于日本，并成为双方加深合作的障碍；日本太空能力发展相对弱势，迄今在防卫上仍严重依赖于美国的卫星数据和态势感知能力，这制约着其在对美合作中获得平等地位及预期收益；日本国家经济低迷及财政状况紧张，导致其难以在太空军事

领域持续大量地增加投入；日本现有法律体系仍对日本军事利用太空、公开推动军事项目有诸多约束；等等。当然，上述情况也刺激着日本积极地增强自身能力，包括加紧构建独立太空军事体系，增强军工产业活力，设法推动相关安全法制修改，进一步解除军事化限制，力图在对美合作中确保有利地位。

三是日美强化太空军事合作对太空安全治理造成负面冲击，也加剧了对华安全矛盾。日本声称与美国等盟国的太空合作旨在“实现太空和平稳定”，但实际上，日美截至目前的联合行动不仅无法解决太空安全治理的诸多结构性、制度性问题，反而发挥了“负面示范”作用，进一步刺激其他国家加紧太空军事能力建设，从而加剧了太空军备竞赛。日本利用日美同盟助推其太空战略军事化，且积极推动太空资源向实际军事能力的转化，特别是借此大力构建超越“专守防卫”原则、具有先发制人特性的“反击能力”，显然无助于本地区力量平衡与安全互信的建立。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在对华竞争心态的驱使及美国战略的牵引下，积极推动对华姿态“由守转攻”，要求增强对华博弈的“实力后盾”，^① 这一高度安全化、对抗式思路也日益鲜明地反映在太空军事领域。尽管中日在民用航天领域仍保持合作，但安全互信的缺乏已制约了双方合作的开展。日本协同美国炒作所谓“中国太空威胁论”，充当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对华“监视器”，特别是日趋将自身太空军事能力的发展用于增强对华方向的海空监控及导弹威慑，乃至加强对事关中国国家利益利益的东海、台海、南海局势的介入，^② 这将导致中日安全矛盾更趋尖锐、复杂。在日本追随美国、将中国界定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的前提下，日美当前太空军事合作显然无法理性、妥善地应对国际太空事务中新兴国家的崛起，也难以建设性地推动太空安全治理的发展。

（责任编辑：陈梦莉）

① 神保謙「日本の安全保障戦略の新しい展開」、『国際問題』2023年10月号、6頁。

② 「米宇宙軍トップ『中国は全領域で敵対的』日米一体化、地球の外でも」、『朝日新聞』2023年9月25日。

Abstracts

An Analysis of Japan – NATO Security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iance Transformation

Xie Xiaoguang and Song Zhaosheng

As an important node in the “networked” expansion of the U. S. alliance system,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has formed a linkage with NATO’s turn toward “Asia – Pacificization”, and against this backdrop, Japan – NATO security cooperation has shown a clear trend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cess of Japan – NATO security cooperation has unfolded in parallel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th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and NATO, evolving through stages from marginal detachment, to partial involvement, and eventually to embedded integra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and NATO have continued to converge, with factors such as balancing external threats, coordin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and fulfilling internal demands serving as the primary motivations for promoting Japan – NATO security cooperation. As Japan and NATO deepen their collaboration i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practical operations, and modes of engagement, the constraints inher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of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and NATO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nounce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U. S. mediation, the divergences in coordination objectives, and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security dependence together define the limits of Japan – NATO security cooperation, preventing their relationship from advancing to a coupled stag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traditional military alliance. Within a foreseeable scope, Japan and NATO are therefore expected to maintain a posture of “limited strengthening”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continuing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embedded interconnection rather than evolving into a comprehensive military alliance.

Japan’s Space Cooperation with the U. S. in the Context of Japan’s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Strategy

Lu Hao

In recent years, driven by a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strategic autonomy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y, Japan has pursued a more proactive approach to securing the strategic high ground in outer space. It has advanced the militarization of its space strategy along multiple fronts, designat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a central means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U. S. – Japan space cooperation is marked by a pronounced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military character, grounded in their so – called shared “threat perceptions” and reciprocal strategic needs. Increasingly, it has become an emerging driving for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with cooperative mechanisms strengthening and displaying tendencies toward multilateralization and networkization. At present, U. S. – Japan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space is accelerating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reas, including facility sharing, force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nd rule – making. Japan’s strategic initiative and goal –

directed orientation in both the military utilization of outer space and in spac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re visibly intensifying. However, the deepening of U. S. – Japan military collaboration in space has exerted negative impacts on space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has further exacerbated security tensions with China.

The “Dual – Layer Hedging” Strategy of Japanese Semiconductor Firms in the Context of U. S. – China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Wang Chao and Wei Peng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as emerged as both the focal point and the critical arena of U. S. – China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Under intensifying U. S. pressure on allies such as Japan to pursue “de – Sinicization”, semiconductor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nstrument of geopolitical contestation. In this context, Japanese semiconductor firms have adopted a “dual – layer hedging” strategy that combines state and market dimensions, leveraging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to promote the revival of Japan’s semiconductor sector. On the one hand,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y hedge against political risks by aligning with U. S. – Japan governmental regulatory policies, conducting micro – level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China, introducing key overseas resources, and consolidating domestic industrial foundations, thereby enhancing strategic autonomy on the production side. On the other hand, at the market level, they implement commercial hedging by expanding counter – cyclically into China’s mature – process market while simultaneously cultivating high – end application market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us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configuration on the sales side. Shaped by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de – Sinicization”, the endogenous impetus of industrial policy, external pull factors, and their relatively weak discursive power with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value chain, Japanese semiconductor enterprises have pursued this “dual – layer hedging” strategy to advance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ith Japan as a supply – chain hub, to constrain China’s semiconductor upgrading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ultimately to acceler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power structure while expanding the flex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 Efforts to Safeguard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in the Postwar Era

Zhang Jianli

The issue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has become a prominent topic of concern across disciplines such as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postwar Japan’s practices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culture” has been treated both as an object requiring protection in line with the times and as an instrument for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This dual characteristic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several areas, including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 the absorption and instrumentalization of Western bourgeois values, and the culti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soft pow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mperor system and the utilization of the imperial family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ustaining Japan’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enhancing its national image, though the declining number of imperial family members has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system’s continuity. While Western bourgeois values have gradually permeated Japanese society, the so – called “values diplomacy” has achieved little substantive effect. By contrast, the culti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soft power have proven highly effective, both in boosting domestic cultural